

为祖国征战的岁月

(下)

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印

为祖国征战的岁月

(下)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印

智斗叛徒

吴桂达

抗战胜利，我军北撤以后，锡西地区没有留下一个干部、一个党员，成了我党工作的空白地带。我作为武南地区我党工作组副组长兼党书记，把这一情况向地委联络部长徐行（储少白）同志作了汇报。徐行同志说，无锡和镇江地区比武进、常州更重要，今后打上海一定要先打下苏州、无锡；打南京一定要先打下镇江，这两处打下后，常州、武进的敌人不战而退。因此这个空白地区一定要去占领，要设法在该地区，尤其是铁路沿线的重要工厂如戚机厂、电厂等重要部门发展党员，组织地下军，为今后迎接解放军总反攻做好准备。我根据这个指示，在组织的安排下，先后把澄武锡工委干部和武（进）北留守处干部王鹏、蒋建乔、酆琴、汪明、杜平波、张志强等数十名干部从丹北、武北、澄西等地送到锡西地区，以商人、教师等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我把戈菊英（她是我武南淹城区区委副书记顾彬的妹妹，1947年由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杨市园乡支部书记兼联络员）家做为最可靠的立足点，集中开会研究工作，都在她家。

1947年的一天，我正在戈菊英家西厢房和她商量工作，武工队员陈咬金（陈义）突然窜到戈家。当时，一般武工队员并不和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他的突然到来引起

了我的警惕。我问他来了几个人，他说就他一人。这就更不对了，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战斗打散了，一般情况下武工队员不单独活动的。我问他来干什么，他支支吾吾讲不出。我情知不好，陈咬金是从国民党的兵变成伪军又向新四军投诚，大军北撤后曾逃到上海，后又回来参加武工队的，经历复杂，属于那种有奶便是娘的角色，很有可能已经投敌了。我向戈菊英发出早已约好的暗号：向她眨眨眼睛（表示陈咬金可能已经叛变），又用手抓了抓头发（表示要戈菊英拖住他，不要让他离开，以便我寻机脱身），再用手抓两下屁股（表示如果他要揪我，就准备动手搏斗）。戈菊英随即摸了摸自己的耳朵，表示一切都明白了，她会见机行事。我便站起来和陈咬金握手说：“陈同志，我去厕所方便一下，请等一等。你要找钱梦梧还是陆道南或者有其他事情，等我来后再谈吧。”陈见我要走，也想跟出来。戈菊英拉住他说：“他去大便，你跟着去做什么？我还有话问你，我们先谈谈嘛，等老吴来后你们再详细谈不好吗？”戈菊英边说边拖过一张大方凳，顺势坐到房门口，堵住了陈的出路。

我在戈菊英家西厢房脱身后，打开后门，见杨市园镇方向有50多个国民党兵向戈巷村上走来，西松坟地上已经架了机枪，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我的判断没有错，陈咬金是真的叛变投敌了。怎么办？我稍作思考，从墙角掬起一把锄头，装着下田的农民，走向田野，直奔北新桥方向而去，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事后戈菊英告诉我，我离开后，戈菊英采用了拖延时间的方法缠住了陈咬金并想方设法麻痹他。她一边给他倒茶，一边和他瞎扯：“陈同志，你和陆道南最近在哪里活

动呢？常见到王子达、钱梦梧他们吗？他们现在在哪里？都有半年没来我家了。你们过去抗日，一天要跑几十里路，打击日军，群众没有一个不佩服你们，都称你们为功臣，新四军是人民的好军队。可是大军北撤后，你们留下这几个人，东转转西溜溜，能战胜国民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看你们还是去苏北吧！江南让给国民党吧！大家都是中国人，你打我，我打你，这个仗要打多少年，抗日八年，老百姓听到打仗恨透了，你们快快停下来，不要打了好吗？这是第二个问题。你们来我们老百姓欢迎你们，因为你们打走了日本鬼子，是爱国主义者，这样的军队我们能不给你住吗？可是给你们住了，给国民党知道了叫‘通匪’。我们想不通，我们又没有叫你们去打国民党。再说，如果国民党来我家，我们也会给他住的，因为他是中国军队。中国人，中国军队来要住，能不给住吗？给中国军队住后，你们会叫我们私通‘国民党’吗？如果这样，老百姓真是两头受气了。”说了一会，估计我已走远，她又站起来，边开门，边说：“我去看看老吴为什么还不来，你把我提的问题想一想，等会儿回答我吧。”陈没有答复戈菊英，也跟着她走出房门。这时陶金良率领的武进县保安队已进入戈菊英家，东找西查，只见后门开着，什么也没有找到，一无所获。陈只得同着 50 多个保安队，灰溜溜地向西走了。因为戈菊英的机智，才使我顺利脱险。

后来我们了解到，陈咬金曾与武进县保安队中队长陶金良一起吃过官司，蹲过监狱。参加武工队后，他过不惯地下斗争的艰苦生活，便向陶金良自首，当了叛徒，带领保安队大肆查抄我武工队宿营地，妄图摧毁我武工队

的领导核心。到戈菊英家那天是他叛变的第二天，以为无人知道，想从戈菊英嘴中骗取线索，捉拿钱梦梧、陆道南、张涛等武工队领导同志向敌人邀功领赏。碰巧遇到我，他知道我的交通员身份，认为从我嘴里能打听到武工队的行踪，便没有立即抓我，想从我嘴里套出情报再说。

我脱险后，看着敌人走了，又立即找到戈菊英，让她马上去武进陆家头，告知陆道南的父亲并请他转告陆道南，陈咬金已经叛变。我自己则立即去找王子达、钱梦梧，汇报陈咬金叛变的情况。

由于及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陈咬金在锡西东奔西窜，没有找到一个新四军。终于露出了叛徒的嘴脸，在武南各地大肆活动，疯狂清剿，毒打村民，侮辱妇女，抢掠财物，残杀无辜，捕捉我抗日将士家属，亲自杀害我原丁舍区交通站王金娣的母亲陆如意同志。陈还配合反动区长羊宗达，杀害长期掩护我地下工作者的曾宣大同志和胜东乡陈家边支部书记张焕清。曾宣大同志的头部、胸部共被打了 18 枪，还被剖腹挖心，其手段之残忍，真是令人发指。凡是当初陈住过的地方，都遭到搜捕和毒害。陈在戈菊英家走后的当晚，就查抄了 90 多个宿营地，大部分地方都遭到毁灭性破坏。武工队一时难以找到可以安身的宿营地，连续 90 多天住在野外茅柴棵里，不敢生火做饭，只能向农民借点大米，炒熟后放在布袋里作为充饥的食物，白天太阳曝晒，夜晚蚊虫叮咬，过着原始人类一样的生活。

隔了几天，陈咬金又带着陶金良的保安队到戈菊英家搜查、骚扰。后来我们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由杨市园镇公所去函武进县保安队，说是你方越境搜查，今后必须

通知我方，否则真假难辨，我将以共军还击，发生误会，一切后果由你方负责。武进保安队才未敢再去，戈巷等地才能成为较安全的地区。戈菊英家仍是地委主要领导人陈云阁和张志强等人的地下联络站。直到1949年4月，一直未出问题。我仍然常常住在她家，负责苏北一地委、江南工委和苏南各地的联络工作。戈菊英和其父戈荣根仍担任交通联络员，直到无锡解放。

1950年，叛徒陈咬金被礼嘉区公所捉住，不仅不悔过自新，反而顽抗到底，经区法庭审讯和县委批准，在肃反时镇压了。他在枪决时仍进行顽抗，用脚踢断了桌子脚和一张凳子，真是与人民为敌到底了。

回忆鲁西南时楼遭遇战

应鹤鸣

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6月28日,我华东野战军一、四纵队组成左路兵团,深入鲁南蒋军敌后,7月7日攻克费县,全歼守敌一个旅,再克峰县、枣庄。徐州之敌十分恐慌,被迫将西调追击刘邓大军的一个军回保徐州。7月14日我一纵攻滕县,四纵攻邹县,由于连续阴雨,弹药大部受潮失效,鲁中敌军7个整编师(军)又蜂涌西来,我军于7月23日主动撤出战斗。这时鲁南仍然连降大雨,大小河道水位暴涨,地势低洼地区一片泽国。蒋介石认为天赐良机,集中5倍于我之兵力,西追北拦南堵,妄想将我一、四纵队合围后聚歼。我军在叶飞、陶勇司令员正确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在8月1日突出敌军重围,8月3日在济宁北面大长沟渡过运河,胜利摆脱了追击的蒋军,与右路兵团胜利会合,进入鲁西南平原嘉祥地区。

当时我是四纵队十师三十团五连的一名战士。8月26日,我三十团与沿砀山公路北犯的蒋军王牌主力军第五军,在单县通向砀山之间的时楼村发生了一场不期而遇的激战。战友们英勇奋战,打得敌人死伤累累,胆战心惊,显示了我们新四军老部队能攻能守的好传统,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军冒着阴雨天气，经过连续几天的行军。8月26日黎明到达有200多户人家的时楼村，大家都十分疲劳，干部们察看了地形，布置了警戒，开罢早饭，除了值勤人员，我们都进入了梦乡。8时左右，枪声大作，四连的哨兵与走近的敌五军先头部队交火了。枪声就是命令。我们一跃而起在营连干部指挥下，迅速利用围墙和墙垛的射击孔进行抗击。部分人员上了屋顶，居高临下，不但可杀伤敌人，又便于观察高粱地里敌人的活动情况。排长又叫班长朱明山派一个小组到敌占村庄去侦察。我和小组其他两位战友，沿着村东外边小路隐蔽地摸向敌占村庄，发现敌人很慌乱。正在构筑工事挖掘堑壕，我们回来后向排长作了汇报。

这时四连守卫的阵地前，敌军官逼着士兵打冲锋。由于敌人不知其前进方向有水塘，当敌人冲近时，为我四连严密火力阻挡，一批又一批敌人跌进水塘，敌人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去，结果在水塘里留下了几十具敌人的尸体。

敌人稍作喘息后，改变正面攻击方向，集中兵力一次又一次向我五连扑来。下午3时左右，敌人两个排兵力，冲到离我土墙约20米距离时，我一排二班长带领全班战士抓住杀敌良机，一阵猛烈射击之后，又集中手榴弹，投向敌群，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伤兵。二排在房顶上发现敌营长模样的人在一个坟边指挥。我营首长知道后命令机炮连的迫击炮手向该墓地开炮。当时仅有的3发迫击炮炮弹，发发命中，炸死了敌营长，摧毁了敌人营指挥所。同时，二排六班轻机枪手王景保在屋顶上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看着高粱地里的

敌人一个个倒下，同志们大叫王景保打得真准，真带劲。过后，约一个排的敌人鬼鬼祟祟地从另一处高粱地里爬过来，当离我们约有 60 公尺时，突然，我们听到雄鸡喔喔的叫声。原来这些强盗随身带着从群众家抢来的雄鸡在惊叫。随着喔喔叫声，我们全班集中火力向敌人猛打，敌人像受了伤的野猪样乱跑乱叫。就这样，因为几声鸡叫，敌人在高粱地里被我们打死了 20 多人。

在打退敌人几次冲锋中，五连副指导员和近 10 名战友负了伤，4 名战友阵亡。到下午 4 点多钟，一营来换防，我们一排 20 多人奉命移交防地后，我和连部通讯员刘文富两人负责把负伤的副指导员送到包扎所去。正当我们离开村中间的小路时，敌人打来的迫击炮的弹片，炸伤了刘文富的左眼，溅进了我的右胸，我也成了伤员，经急救处理后，与 10 多名伤员向邻村的团包扎所转移。

与五连据守的一排民房相距 30 多公尺的磨房与独立家屋，由二营机炮连一挺重机枪和一个班的步兵扼守，他们用密集火力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击。打到下午 5 时左右，这个班的伤员后撤不久，一个排的敌人抢占了这处独立家屋，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营部命令立即反击夺回来。五连指导员黄浩，集中二、三排没有负伤的 30 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分成两路迂回包抄过去，经过拼手榴弹和白刃格斗，歼敌一个排，抓了 10 多个俘虏。指挥并带头冲锋的黄浩同志在离磨房 10 多公尺处负了伤，通讯员黄怀仁把他抢救下火线。打到天黑敌五军龟缩了回去，我军从容地掩埋了烈士遗体后转移。

时楼村遭遇战，我四纵十师第三十团共消灭敌新五军 400 多人，村子四周高粱地与水塘里，敌人就遗尸 300

多具。我所在的第五连，打得英勇顽强，战术运用得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嘉奖。同志们都说：依靠美国主子，全部用美械装备起来的蒋军王牌新五军，也在我们手里栽了跟斗，为反革命蒋家王朝卖命，最终一定难逃覆灭的命运！

智擒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

黄泽洪 江静波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后，为保证首长正确部署南下的行动，上级命令我十九师五十七团侦察队，立即组织一支小分队，迅速挺进临城一带敌占区，了解敌情，伺机捕捉俘虏。限我们在三天之内，捉两个舌头来。

侦察队长徐斌接到命令的当天下午，就把捕俘任务下达到我们一排。经过研究，决定从我们排抽出钱玉标、张明富、邓永昌等7名精明能干的侦察员，由我这个排长带队，组成了捕俘小分队。

夜色朦胧，秋风习习，我们这支小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便衣，潜入了敌区。这样我们在敌区可以公开带枪活动，又了解敌情，更便于我观察地形，找好进出道路，乘机捉俘。万一没有机会，为第二天再潜入敌区作好准备。我们在敌区活动到下午四时光景，就向解放区边界靠近了，当行至在临城西北一家茶店时，就打算进店喝点水，吃顿饭。

进茶店我目光往四周一扫，只见茶店里喝茶吃饭的有30余人，有一部分是我军打下济南后，逃到临城来的国民党残兵，另有十几个人我觉得不同一般。尔后，我便坐下来静静地喝茶，以观察他们言谈举止。听他们说话的口音，使我确认大部分都是南方人，从他们喝茶吃饭走

路及抽烟的情形看，我认定他们很可能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员，或高级官员。我随即将捉俘的信号——白毛巾往右肩上一放，在一旁的七名侦察员，一个个嗖嗖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如猛虎似的一齐上前威逼着我对面的这伙人，并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不准动，谁动打死谁！”

这伙人一个个都傻了眼，呆若木鸡，面面相觑，都只好乖乖地举起了手。紧接着我们强制性地搜查了他们每个人的全身。随后，我一手叉腰，一只脚往前面的凳子上—踱，用另一只手拿的短枪，把大盖帽往上顶了顶，严厉地逼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说！”

“嘿嘿，我们都是商人”。其中有一个人皮笑肉不笑地解释着，尔后又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从南方来，去济南的，没料想济南遭到了战事，没能回得去……”

“你们不是商人，是共军的军探，来刺探国军情报。”既然是装国民党军的，那就要装得像一些，因而我一口咬定他们是探子，便强硬地说：“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押到师部去！”

“弟兄们有话好说。”这时那伙人中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笑呵呵地迈着习惯的四方步，来到我跟前说：“我们都是商人，怎么能不是商人呢？”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统统送到师部关起来，等审查过后再说！”

“兄弟，你们是哪一部分的？”这个人笑眯着眼，仍然客客气气地称呼，和和气气地问话。

“我们是七十七师搜索排的。”我听他的问话，心里便有了底，答道：“我是排长。”

“七十七师师长姓什么？”这个人细心地端详着我的

一身着装和我手中的短枪。

“姓王，你认识王师长？”我回答。

“认识，不那么熟悉。师部过去曾在我家住过。”他完全以为我们是七十七师搜索排的了，便小声对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看他们上钩了，但不知他们是些什么人物，仍板着脸，紧追迫问了一句。

“我们是国民党山东省省党部的。”终于，这个人亮出了“招牌”。

“他就是省党部主任庞镜塘。”旁边的一个随员插了一句。

“啊，庞镜塘！”我心里不由得嘀咕道。省党部主任，这个官可不小。打济南之前不少同志都知道，山东济南府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军界司令王耀武，一个是党界头子庞镜塘，王耀武在打济南时被我们活捉了，大党徒庞镜塘却狡猾地跑到这里来了，抓住这条“大鱼”，不比抓几条国民党兵那些“小泥鳅”强得多吗？如何抓住他们呢？我感到在敌占区活动，距敌军比较近的情况下，只能智擒，不能力捕。因而我装作吃惊又有些惧怕的样子，便急忙又是问候又是抱歉地说：“长官，走到这里很不容易吧，一路上辛苦了！下级不知，有失远迎！”

“哪里，哪里，这哪能怪罪你们呢！”庞镜塘长官架子十足，还乐滋滋地褒扬我们说：“你们做得对，就是要肃清共产党的军探嘛！”

说到共军，庞镜塘极端仇恨，咬牙切齿，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骂了一通。听到他这样谩骂我们的党和军队，气得我真想一枪毙了他，但为了把这

条“大鱼”捉到手，我只得装着笑脸说：“那共军哪有咱们国军这两下子……”最后我有意问他，“庞主任，随你来的还有哪几位长官？”

“你看，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是省银行经理，这位是国防部‘人民服务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这位是……”

我边听边琢磨，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这帮人带到解放区去呢？最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对庞镜塘说：“这个地方离共军边界太近，为了长官们的安全，还是由我们护送到师部去吧！”

“那好，那好。”庞镜塘听了非常高兴，“谢谢你们，那就麻烦你们送一趟吧！”

这时的庞镜塘是满面喜色，得意洋洋。他如脱网的鱼又逃入大海，又象死囚大赦一样侥幸万分，一定在暗暗庆幸自己：总算跑出来了。也难怪，从济南出发，一路上提心吊胆，化装成商人，巧言应变狡猾地越过解放区的一道道哨卡，一口气逃到了“安全地带”——临城国民党境内。在这里又巧遇了“七十七师搜索排”护送他们到师部，他们怎能不欣喜，怎么能不感到侥幸呢？

“长官，这里共军经常有埋伏，从安全方面考虑，还是绕道走好！”

庞镜塘正在像做梦一样想着他的心事，我的问话打断了他的美梦，他两眼眨巴了一阵子后说：“好吧，绕道走。”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战斗小组，有前面带路的，有后边打掩护的，这帮家伙走着走着，有些着急了，不住地问：“离师部还有多远？”

“快到了，”我回答说。为了让他们走快些，我在后面乘他们不注意，故意向天上“砰砰”打了两枪，并催促他们说：“快走，共军来了。”

这帮家伙跟着我们便跑了起来，糊里糊涂地一口气跑到了我们侦察队埋伏区。当庞镜塘他们突然发现面前有着许多解放军，一个个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吓得额头上直冒冷汗，腿都走不动路了。

而后，我们把庞镜塘一伙押解到侦察队队部。庞镜塘脸上的欣喜得意之情不见了，他也许是过度的疲惫，也许是过于害怕，只见他垂着头，面色苍白，神态颓唐地坐在那里。此时我走过去问他：“现在你看共军有没有本事，能不能打掉你们的反革命气焰！”

庞镜塘听到我的问话，抬起了头，有气无力地伸着大拇指，不那么情愿地说：“能，能，共军一定能胜利，我算服你们了！”

当晚，我们把庞镜塘一行六人，押解到团部去了。不久，七纵队领导机关给我们贺信表扬和通令嘉奖；华东野战军给我们通令表扬；华东军报也刊登了我们智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的经过。

决战淮海 往事灼灼

苑 春

翻开已经发黄的淮海战役战地日记,46年前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翻腾起来。

窑湾歼敌

追上去!追上去!决不让敌黄伯韬兵团逃回徐州!

1948年11月8日,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从新安镇越过陇海路,猛追逃敌。第二天太阳西斜的时候,作为掩护黄兵团西逃的左翼一个军——六十三军被堵围在运河东岸的窑湾镇。

外围扫清后,11日下午总攻开始前,我到担负突破窑湾北门任务的四团二营去采访。四连长林宁、副连长董兰亭刚看完地形回来,向我点了点头,一面就着萝卜干啃煎饼,一面交谈着。各班战士们正在战壕内开阵前“诸葛亮会”。我挤到九班,九班长王数喜把捆得结结实实的炸药包对我扬了扬,指着前方堤埂后面敌人的鹿寨与暗堡,操着胶东口音自信地说:“我们保证给全连扫清突击道路上的障碍!”正说着,我野炮营的炮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像狂飚,像雷霆,狠狠地砸向敌人!总攻开始了!战士们按预定的方案,先后